



“互联网+”时代文化领导权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张 博

(中共淮北市党校信息中心, 安徽淮北 235000)

摘 要:随着互联网发展、各种思潮以及国际国内错综复杂因素的冲击,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遭遇质疑,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正面临着严峻挑战。能否客观全面地对待当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面临的严峻挑战,对新形势下科学文化方针政策的制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等问题至关重要。

关键词: 互联网+时代;文化领导权

中图分类号: G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16)12-0001-05

PDF 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6.12.001

Discussion on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ultural Leadership of Internet Plus Era

ZHANG Bo

(Huabei Municipal Party School, Huabei 235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various trends of thoughts conflicts, Marxism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has been challenged, and the cultural leadership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This paper talks about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new scientific situation and cultural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t gave the suggestions on consolidating the ruling foundation of socialis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 words: Internet plus time; cultural leadership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一个政党的领导权,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还包括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领导权。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同时,花费了大量精力来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有力地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网络的普及,网络社会以其虚拟性、高效性、开放性特征,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结构和功能,与现实社会形态同时存在、相互交融,形成了

错综复杂的全新时空,全面塑造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执政环境。各种思潮以及国际国内错综复杂因素的冲击,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遭遇质疑,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正面临着严峻挑战。是否有主导能力进行有效引导,折射出我党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考验着领导干部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执政能力。

一、“互联网+”的深远影响

近 20 年来,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势头迅猛,从最初的 586 电脑,到互联网的普及,再到今天微博、微信、电商、互联网金融、移动互联等各种应用的蓬

勃发展,中国互联网正式进入了“+”时代,也深刻影响和改变了我国社会各方面。

(一)“互联网+”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20世纪,加拿大原创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成名作《理解媒介》一书中,提出了“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在如今“互联网+”时代,这一观点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印证。网络作为承载信息的工具,不仅在信息传播领域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也深刻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

目前,过半的中国人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都无法脱离互联网,诸如朋友之间的联系、了解社会最新动态、查阅资料、网上购物、订票等,都与其息息相关。互联网正在改变中国乃至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成为信息的共同体。“互联网+一个传统行业”的模式,不仅可以实现交通运输、物流配送、商贸旅游、餐饮家政、在线教育、育幼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资源配置的整合与优化,还催生出各类新的消费业态,如新型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在线教育培训平台、智慧物流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构建等。

当代政府的公共服务也已积极结合互联网,实现更深层次的改革。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让居民和企业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简除烦苛,禁察非法,使人民群众有更平等的机会和更大的创造空间。”^[2]

2015年,腾讯公司与各省市合作,共建互联网智慧城市服务项目,从公共服务、交通、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进行了‘互联网+传统行业’的新尝试。2016年,配合‘十三五规划’创新发展的理念,各级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领域将继续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政府服务机制的改革,将在未来打造出更简洁、高效的政府服务模式。

(二)“互联网+”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权力结构

我国传统的社会权力结构为垂直型,权力的分布是垂直分割的,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权力相互之间联系极少,各自独立,并且各个地方的权力相对固定而集中。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整个社会的权力

结构逐步向扁平化发展,各地权力之间开始相互融合。随着网络的发展,很多事情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体社会结构更趋于复杂化。所有的变化都源于用原有的一套管理媒体的方法管理互联网失效了,网民的发言自由化,话语权开始分散和下移,下移到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网民都是主持人,都可能是网舆事件的中心点。这些直接推动了社会结构向扁平化发展。

(三)“互联网+”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

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今天,几乎任何一个比较大的公共事件,在网民的不断讨论下,无论是提出的建议还是批评,都会或多或少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相关政策的完善。

“郭美美炫富事件”后,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公开选拔干部,促进了我国社会组织向标准化方向靠拢,也为我国社会组织方面公共政策的改革提供了实例;甘肃正宁校车惨案则于当年推动了校车安全条例的出台;关于 pm2.5 值的讨论,促使环保部在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时,把 pm2.5 值列入了必须要测量和宣布的数值。互联网技术给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深层次的变革,已经开始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发展进程。

二、“互联网+”时代面临的执政新问题

进入“互联网+”时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极大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党和政府的执政方式和理念。

(一)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受各类思潮冲击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国外各类思想潮涌而来,对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形成了新的挑战。雷锋是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代表和典型之一,但这些年每到学雷锋日,网络上就会有各种各样质疑的声音出现,诸如,有没有雷锋这个人? 雷锋精神有没有过时,还需不需要学习雷锋精神? 雷锋的那些事情是不是真的? 等等。到百度搜索“雷锋造假”词条,显示有 1000 多万,其中大部分是针对雷锋生前

一些好人好事的照片提出质疑。雷锋精神原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非常可贵的东西,在任何一个时代与国家里,舍己为人都是非常崇高的品质。被大家所反感的不一定是雷锋精神本身,而可能是长久以来意识形态树立典型的这种方式和语言。如何用一种贴近时代的新方式去展现这种永恒价值,是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二)党和政府公信力屡被挑战

随着网络上的各类负面事件尤其是与政府和官员相关事件的不断增长,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受到影响。郭美美事件发生之前,中国红十字会所接收到的捐款数额约为62.6亿元,郭美美事件之后降至8.4亿元,降幅达到86.6%。^[3]此类事件对于官方的公信力无疑是一个重创,而公信力一旦丧失,非常难修复,长久就会陷入所谓“塔西佗陷阱”,所以对中国红十字会各种事情的质疑时隔不久就会出现。此外,像天津港爆炸事故、股市暴跌、上海踩踏事件等,都在影响人民对党的执政能力的信任。如何避免与妥善处理此类事件,是对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挑战。

(三)党和政府的话语空间被逐步压缩

随着网络通讯工具、各类论坛、移动互联的普及应用,党和政府掌控的传统媒体话语空间越来越少,这是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提出的新的难题。博弈更多地出现在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官方试图要设置的事情的角度,与民众谈论事情的角度往往相差甚大,有些话题在网络上已经非常热了,但是对同一话题官方媒体却不愿谈论,或者仅轻描淡写地提一下,两个舆论场之间有时会表现出分裂或对立的状态。其中,谁更占上风?从热点事件传播这一点来看,2013年之前,微博是社会舆论的首要策源地,2012年网络热点事件的首发主题中,由微博首先曝光的占到32%,由都市报先曝光的约15%,由通讯率先曝光的占10%,地方论坛占9%,广播电视占8.3%。自2013年之后,微信取代微博的地位,中国无线舆论场正式形成,社会舆论开始向更加方便、更加隐蔽的方面发展,使得政府的监管和引导越来越困难。

(四)社会安全事件监管难度加大

随着网络的发展,各种维稳事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源、组织、蔓延、扩大都是通过互联网来完成的,导致政府在社会管理上的困难。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与互联网的基本特点有直接联系。

一是言论与行动边界难以确定和预警。言论自由是网络的常态,网络上每天有大量的人发布大量的舆论,如何判断哪些言论会变成真正的行动?难以确定言论和行动的边界,往往导致预警起来非常困难。

二是对网络言行真伪判断困难,难以操作。对网络上存在的大量言论,如何判断真假也很困难。要从大量的信息中判断哪些最后会变成真实的行动,并且提前做出预警,无论从操作上,还是从预防的成本上都非常困难。

三是公私领域边界难以确定,依法办事难。互联网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边界很难确定,要依法执行很难找到法律上的依据。如在微博朋友圈里发的信息,在微信里发的私信,在朋友圈和在公众号里等不同的空间所发的信息,如何去确定它的边界,究竟是属于私人空间还是属于公共空间,朋友圈多大属于公共空间等,对此要加以明确界定很困难。

三、顺应“互联网+”时代,加强文化执政与领导权

民众上网,民意就上网,舆论场和社会情绪也随之在网上体现。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网上网下形成同心圆,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要顺应“互联网+”时代,加强文化执政与领导权。^[4]

(一)加强顶层设计,重视文化领导权建设

“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5],这句话已经被苏联解体所验证。我党坚持左手“笔杆子”,右手“枪杆子”,历经风雨,才开创出如今的局面,从建党初期我们就认识到,要想赢得民众的精神拥护,就必须重视文化领导权建设,引领整个社会文化。文化领导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贯穿始

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所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新中国成立后,随之而来的是我党作为执政党角色的转变,此时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性就愈发凸显。事实上,无论是解放前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以及现在的改革深水区,群众认同资源都是我党执政的基础性资源。如果党的文化思想能够支配整个社会的道德理念和秩序,进而主导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观念,它自然就能处于领导地位,其顶层设计,无疑是建设文化领导权的关键。

(二)完善互联网立法,明确职责

近年来,针对互联网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法律制度,已制定了三十多部。依法治国提出后,针对网络立法的力度进一步得到加强,但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上位法的缺乏;现有法律部门层面的法规比较多,相互之间交叉、缺位、矛盾的现象比较突出;如何增加现有法律的适用性,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使之更适用于互联网的管理;基础理论研究不足,针对互联网出现的一些新技术特点,尚需进一步完善。

互联网出现之初,政府的管理模式是全包全管,这种模式一是管理起来困难,二是经常在国际社会中遭到批评,被诟病为全能政府,管得太多。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现在形成了多层次的管理模式,其中最底层的层次是行政监管与专项行动相结合,并且专项行动的力度和密度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大。此外,还有整个互联网行业的自律、群众的监督以及网络主体的自觉。层次划分得越清楚,政府就越明确该管什么。

(三)完善危机事件处置机制,凝聚向心力

首先,姿态决定一切。在危机处置中首先要防止自造危机,要把事情的止损点止于事件的危害本身,不能因处置不当引发次生危机,这要求处置事件时不回避,不拖延,不包庇。对网民要亮明态度,坚决站在公平公正一边。否则,网民的第一波情绪若不能及时化解,有可能进一步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因此,群体性事件预防的第一道关卡不是维稳,而是舆情。

其次,建立事件处置应急机制。网络时代对于

事件的处置,要实行双处置加双进入。双处置,即对舆情和事件同时处置,不能先把事情处理完再慢慢去管舆情,届时舆情可能已发酵得不易控制,让自身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从机制上讲,需同时成立临时新闻中心和事件处置小组,两个小组之间要相互进入,即事件处置小组对于事件每一步处理的最新进展,都要通过临时新闻中心对外发布消息。反之,临时新闻中心对外发布每条消息之前,都要经过事件处置小组的授权和认可,以保证发布的每条消息都准确、权威、统一。

再次,危机事件新闻发布,此举是让公众听到政府声音的最直接方式。一要把握好发布的时机与方式,只有在充分准备后,能够提供准确、详实和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及结论的情况下,才适合召开新闻发布会。二要主动设置议题,设置的议题要涵盖事件是什么、情节怎么样、性质怎样定、影响有多大,人们对一个事件的关切主要是这四个方面。其中在事情定性的议题上要慎重,在第一时间还没有了解全面消息时要谨慎谈论,贸然得出结论最终会非常被动。三是对于危机事件新闻的发布发言,要打破常规,直奔主题,不要作会议式的、报告式的语言铺垫。

(四)整合主流文化,做好价值重建

互联网+时代,无论立法管网,还是危机处置与信任修复,都只是一种被动与防御姿态,要主动掌握互联网文化领导权,还需进行文化整合与价值重建。文化是最大的政治,文化的基因超越了国度,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转化为文化话语,是我党未来话语权的趋势。但从目前情况看,仍呈现出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与舆论格局。要改变现状,需加强宣传,弱化意识形态,用新闻传播的理念打通内宣与外宣两个通道。

1. 用网络讲好中国故事

网民对雷锋事迹进行质疑的同时,却自发地选出最美司机、最美医生等,他们身上所传达的其实仍然是雷锋精神,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去讲中国现在的故事。杭州长运司机吴斌,在驾驶大客车行驶时被迎面飞来的制动毂残片刺入腹部致肝脏破裂,仍强忍疼痛,在全车24名乘客安全疏散后才倒下。此

事在全球最大的视频网优酷网上创下单日点击率上千万次的记录,很多国外媒体也纷纷向这个普通的中国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但该视频并不是中国的新闻人所做,而是一家美国电视台在转述此事时做的一小段视频。所以,很多时候中国自己的好故事,对于平凡的普通人做出来的不平凡的事情,还需要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加大宣传与讲述。

2. 发挥主流媒体优势,打通两个舆论场

越是在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越不能放弃自己的地位和相关责任,要做互联网纷乱信息的过滤器,做网络偏激情绪的缓释剂,做社会心态的压舱石。

一是尊重新闻规律,改进传统媒体形态。要尊重新闻基本规律,用做新闻的方式而不是宣传的方式做新闻。二是用好新媒体,打造微博和微信“国家队”。现在中央主流媒体都已开通了相关微博、微信与新闻客户端,并且影响力逐渐增大。《2015年度全国政务新媒体报告》显示,我国的政务管理与互联网正逐步走向深度融合。据统计,目前我国政务微博账号近28万,政务微信公号已逾10万。“两微多端”,即微信、微博与多种移动新闻客户端,已成为新媒体政务发展的趋势^[6]。三是打造并借力新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人民网在2012年4月上市以后,市值相当于《纽约时报》的近两倍,可见其影响力的深远。可用类似的主流媒体引导民众声音,打破“官”与“民”两个舆论场的隔阂。四是建立广泛的“网上统一战线”。不应把所有的网民都看作需防范的对象,要区分哪些是需要依靠的对象,哪些是可以团结的对象,哪些极少数人才是需要防范或打击的对象。我们要做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更多的好声音发出来,而这些声音可能是党和政府自己想发而不方便发出的声音。

(五)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抓手,确保文化统领权

我国的文化建设是一个长远的战略任务,发展的过程中要使之常态化。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是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7]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不仅是政权稳固的保障,也是我国软实力的象征。这种软实力,主要体现在国家对外的影响力和对国内人民的凝聚力上,它是一种“使他人想你之所想,欲你之所欲”的力量。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软实力借助于网络更充分地发挥了其“渗透性”的特点,逐步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种重要力量。因此,如何提升我国主流文化的竞争力,是当前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是文化领导力扩大化的必然结果。要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增强国家软实力,就必须继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其兴国之魂、文化精髓的作用,把当今各种思潮纳入思想统一战线大旗之下,共同向着一个方向努力。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9.
- [2] 李克强: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EB/OL]. <http://lianghui.huanqiu.com/2016/roll/2016-03/8655790.html>.
- [3] 郭美美事件后社会捐款降五成7月比6月少5.2亿[EB/OL]. <http://news.sohu.com/20110913/n319195097.shtml>.
- [4] 领导干部要常上网了解民意[EB/OL]. http://epaper.cqcb.com/html/2016-04/20/content_199306.htm.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539.
- [6] 新华网发布《2015年全国政务新媒体综合影响力报告》[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yuqing/2016-01/18/c_128638812.htm.
- [7]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EB/OL]. <http://theory.rmlt.com.cn/2014/0630/284991.shtml>.

[学术编辑 赵大洲]

[责任编辑 熊伟]